

马列学院的办学历程

□ 吴玉姣

村是建屏县中部的一个村庄，位于滹沱河北岸李家沟沟口，走出村便可看见滹沱河，距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10里路程。

马列学院的用房，一部分是村里闲置的房子，经和当地政府沟通协商，由马列学院征用。还有一部分是老乡主动腾出来给马列学院使用的。

马列学院虽然是党的最高学府，但是办学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上课没有课堂，吃饭没有食堂。学员按小组分别住在村里老百姓家中，大房子住六七人，小房子住三四人，以土炕为主，个别的用木板搭成通铺。大家不分职务高低、年龄大小，挤在一条炕上睡觉，炕前有一张方桌几条板凳，供学员读书写文章用。学校教员引导学员认真读书，提出要学习毛泽东思想与中共党史、党的建设及目前党的政策，并进行专题研究。

尽管当时条件艰苦，但教员和学员的学习情绪都很饱满，积极性非常高，求知欲十分旺盛。教员经常深入学员中调查了解情况，有针对性地帮助学员提高文化和理论水平，学员也虚心主动地请教老师，师生之间互动密切、关系融洽。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将学习成果更好地转化为工作本领、思路举措，成为马列学院的一大特点。

落地生根 一脉相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后，培养一批理论水平高、政治素养好的干部执行党的政策，提高各级干部的理论水平，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这一时期的党校教育是党校事业发展的又一重要时期。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马列学院先遣人员和中央直属机关先遣队一起，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3月，抵达北平香山，暂住慈幼院休整。此时，马列学院对外称“劳动大学”。4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将香山碧云寺拨芳大暂住”。4月14日，马列学院迁驻香山碧云寺西跨院。学员和工作人员住在经过修缮的庙殿或旧房中。食堂设在一个经过改造的大殿中，因为没有桌凳，大家都站着吃饭。上课则在水泉院。这时候，由于教员少，在新解放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运动中，学员派上了大用场。一些理论水平较高的学员被派往校外授课，讲授社会发展史，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既当学生又当先生。安排学员外出讲课，不仅锻炼了学员的能力，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还为当时进行的知识分子改造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10月，马列学院与清华大学正式办理了交接手续，将当时清华大学农学院所在的自得园划拨归马列学院使用。自得园的房产、土地及其他设备一并移交马列学院，可容纳工作人员300多人、学员400多人。马列学院正式迁入自得园，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党校研究生院所在地。

迁入自得园后，学员住宿、上课条件都有所改善，学员们住进了楼房，学习条件之好前所未有。组织机构、教学力量也有所充实。教师队伍除杨献珍、艾思奇、何其芳、周文、何家槐等，还聘请了经济学家王学文、郭大力来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如心讲授中共党史。马列学院在这个毗邻颐和园、风景旖旎的校园内，开始了新中国大规模培养教育干部的新历程。

1955年7月5日，中央办公厅发布通知，中央批准马列学院自8月1日起，改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名称虽变，但是党校人“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始终如磐。

应运而生 气象一新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发布通知，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并委托华北局办理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两个多月后，7月24日，为适应时局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创办高级党校（马列学院）的决定》，由刘少奇兼任院长，马列学院的任务是比较有系统地培养具有理论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

马列学院招收学员的条件是：参加过实际工作（参加学生运动及其他政治运动在内）五年以上，在政治上思想上有相当的思考能力，政治正派，文化程度要能写文章或相当于高中毕业以上的水平。年龄不拘，候补党员亦可。一切学生均须经过考试，但由中央特别批准的高级干部则不在此限。

马列学院时期，对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作出了较为系统的总结提炼和理论概括。马列学院在向毛泽东并党中央正式上报的《关于马列学院的教学任务、教学方针、组织机构、组织领导及党务工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列学院的办学方针为“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报告中说明：“这也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地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方针。根据此方针，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其内容应包括理论教育计划、联系当前实际工作的计划、联系思想改造的计划、组织审查工作的计划四个方面。”这一办学方针进一步丰富了党校教育思想。

校址初定 积极办学

党中央关于创办马列学院的决定下发前后，选址工作已经开始。当时负责筹备办校的同志沿着滹沱河找地方，最后选定在河北省建屏县第八区的李家沟口村。李家沟口



寻找那段轰鸣的记忆

——故乡的“工”字街与“业”字路

□ 潘文曼

街，是城市的筋络。路，是城市的血管。历史风烟中，暮鼓晨钟下，它们独特的风貌，为那漫长的时代书卷留下最醒目的落款。

我的家乡沈阳铁西区，一座曾以雄厚的工业基础闻名遐迩的“东方鲁尔”，一座让我甘愿用半生时光铺洒足迹仍乐此不疲的城区。

漫步于铁西区的街路，犹如与一位世居此地的老工人促膝长谈，坦坦荡荡，直来直去，总是不出三言两语，就会提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段伴随着机器轰鸣的工业记忆。

地名往往凝结着当地人对这块土地的深厚情感与殷切期望，呈现出一个地域特有的文化气质。沈阳铁西区的工业企业较为集中，大大小小300多条道路中，以“工”字命名的有68条之多，以“业”字命名的有20条，其道路也大多与工业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从东面开始，依次是振工街、兴工街、铁工街、西工街，这几条街道首字连起来为“振兴铁西”；再往西，是热工街、爱工街、祖工街和国工一、二、三街，首字连起来读即为“热爱祖国”；来到铁西中部，几条大街分别名为保工街、卫工街，意为“保卫工业”；还有许多蕴藏美好愿景的道路，比如锦工街、绣工街、前工街、程工街，寓意“锦绣前程”；安工街、乐工街，蕴有“安乐”之意；吉工街、祥工街，取“吉祥”之意；繁工街、荣工街是“繁荣”之意；富工街和强工街组成“富强”之意。铁西的路也是如此，像广业路、阔业路、伟业路、大业路、功业路、勋业路……“工”字街与“业”字路交汇

融合，铭记着铁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创造的辉煌工业历史，镌刻出“共和国工业长子”的卓越功勋。

作为一个沈阳人，骨子里就对那段光辉岁月有着深刻的眷恋。每天下班骑车回家，行过和平区与铁西区交界的两洞桥，我常会下车步行一段路。与如今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道路两旁一组题为《晨曲暮歌》的雕塑群，生动再现了那个时代铁西工人上下班时震撼人心的自行车大军场景。透过这些色彩斑斓的塑像，我仿佛回到了儿时，坐在父亲骑的“二八式”自行车前杠上，看着眼前熙熙攘攘的自行车洪流，听着耳边此起彼伏的车铃声，叽叽喳喳地给爸爸加油，努力前行生怕落后……

回到现实，重新追索眼前这片繁华商业区的前世今生。这里曾经是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在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曾创造出多个“第一”，其中最闪亮的还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那枚金属国徽，而这里便是它的诞生地。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签署命令，公布了国徽制式。那年国庆节前夕，国徽的主体石膏模型已经制作成功并获批准，但受当时技术条件限制，制作金属国徽并非易事。沈阳何其有幸，第一机器制造厂（第一机床厂前身）接到了制作新中国第一批金属国徽的光荣任务。厂里上下齐心、攻坚克难，提前20多天完成使命。1951年，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盛大庆典上，沈阳第一机床厂锻造的第一枚金属国徽庄严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绽放着瑰丽的光芒。如今，每当我看

到国徽，都仿佛看到曾经第一机床厂的工人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赤忱和热情，铸成一颗颗五角星、一个个齿轮、一条条麦穗，镶嵌在国徽上熠熠生辉。

一路前行，来到建设大路，道路两侧打造了工业文化走廊，上面大大小小罗列着密密麻麻的工厂名字，沈阳标准件厂、沈阳锻压机厂、沈阳车辆厂、沈阳拖拉机制造厂等等。这些熟悉又陌生的名字诉说着这里曾经灿烂多彩的工业历史，展示着沈阳独领风骚的工业名片，让来往的人们深切感受着跨越时空的工业文化。层层叠叠的名字中，总有一个让我驻足停留、深情凝望，那就是爷爷曾经工作过的沈阳桥梁厂。这是一家英雄企业，不仅设计建造了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还参与了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在抗美援朝期间，沈阳桥梁厂的工人一往无前地开往前线，顶着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抢修鸭绿江大桥、清川江大桥、大凌江大桥以及万城、白马、伏城、清水等多处铁路桥，为铸成“炸不断、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作出了贡献。在那场战争中，厂里共有13名工人壮烈牺牲。儿时每每听爷爷讲起当年的故事，我都会热泪盈眶、肃然起敬。

像沈阳桥梁厂这样的英雄企业在这里不胜枚举，不远处的沈阳重型机器厂也是其中之一。昔日朝鲜战场上，面对力量强大的美军，志愿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是坑道作战。这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战场上亟需的军镐一时之间难以供应，短时间生产出相当数量军镐的艰巨任务部署给沈阳

重型机器厂。工人们把铺盖卷搬到了厂里，昼夜赶工，他们秉承“后方多流一滴汗，前方少流一滴血”的信念，仅用19天时间，比计划提前40多天生产出10万把军镐。这些军镐在朝鲜战地挖出了1000多公里坑道，构筑起牢固的防御体系。偶然的一次机会，我来到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看到橱窗里陈列着一把军镐，正是当年沈阳重型机器厂生产的。当年，志愿军某部战士在弹尽粮绝的最后关头，就是拿着这把军镐与敌人展开搏杀的，这把军镐也被誉为“功勋武器”。透过军镐上那斑驳的锈迹，我看到了它的底色，那是沈阳工业的底色，也是这座英雄城市的底色：造国之重器，担国之重任。

传承工业文化基因，用好工业遗产资源，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铁西区谋篇布局产业结构、实现城区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之一。正如铁西广场上矗立的名为《力量》的吊钩雕塑，虽然在高楼林立、商场众多的繁华商业中心，这样一个吊钩的存在并不很醒目。然而，每一个路过的沈阳人都会情不自禁为之驻足，因为它代表了那个火红的年代，诠释着曾经老工业基地的风采，是这座城市之歌与哭，是几代产业工人的情与爱。

一路走来，暖意盈怀。铁西区每一条“工”字街与“业”字路都让过去和现在交错融合，化为心底最柔软的记忆。用心去丈量那些街，用情来雕塑这些路，每一次举步或驻足都是挚爱的过往，每一次静默或呐喊都是骨子里涓涓流淌的家国情怀。

南浔，江南的封面

□ 林国强



绿的垂柳，让人不禁想起古人月下赏荷花的风雅情境。园林以荷花池为中心，依地形设山理水，荷池南岸主体建筑为临池而建的“退修小榭”，设计精巧，是江南水榭建筑的精品。十亩荷池围在四周，环绕着长廊曲桥、亭榭楼阁，内园则以一座比较大的太湖石假山为架构，山道盘旋，松径一弯，红枫四匝，亭轩相映。比起苏州名园来毫不逊色。莲花塘西侧有一条长廊，横贯南北嵌有《紫藤花馆藏帖》和《梅花仙馆藏真》等四十五方刻石，上镶嵌着各种名家诗书，正草隶篆字体齐全，书艺高超，文采斐然，刻工精细，堪称史料与艺术价值兼备的精品。

与小莲庄一水之隔的，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闻名海内外的嘉业藏书楼，其因溥仪题赠“钦若嘉业”九龙金匾而得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之一。嘉业藏书楼寓肃穆的书楼于精美园林之中，造景立意围绕藏书展开。书楼四周建有荷池，荷池状如花瓶，可做防火蓄水池；以池水代墙，还可接受四面来

风；沿池矗立的太湖石形似十二生肖，池边的香樟树状如华盖。周围紫藤曲桥，石径通幽，为藏书提供了极具美学价值的人文景观。

藏书楼创始人刘承干为刘镛之孙。鲁迅在《病后杂谈》中说，刘氏嘉业堂刊刻的《安龙逸史》《翁山文外》《闲渔闲录》等，都是清政府的禁书，“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此前，鲁迅与友人信中又提到：“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这位“傻公子”便是指刘承干。可见，鲁迅对嘉业藏书楼和刘承干都是非常赞赏的。刘承干清光绪三十一年考中秀才，得过候补内务府卿衔，他自幼第一嗜好就是读书、买书、校书、写书、藏书，爱好目录版本学，自谓“世守中垒旧业”。他不惜巨资大量收购各种古籍书籍，为保存藏书，又花费白银30万两在小莲庄刘氏家庙旁建筑藏书楼。刘承干于1951年11月把藏书楼捐献给了国家，由浙江图书馆接收。现有藏书十万余册，雕版片三万。漫步在风景优美的花园内，看着古朴而充满

书香的藏书楼，让人感受到了那种浓浓的文化底蕴。

不觉间，时间到了傍晚。南浔的青瓦白墙，在微风、夕阳余晖的渲染下静静地伫立着。我们移步到由明代礼部尚书董份所建、独具江南风情的明清古建筑群——百间楼，这是江南至今保存较为完整的沿河民居群落之一，被印上了国家邮政局发行的邮票，如今已成为南浔古镇的地标之一。走在百间楼的街巷之中，斑驳的墙面，乌瓦粉墙、封火山墙、河埠石阶、木柱廊檐，映照出世代江南人家的平实生活，脚踏在青石板上，每一步都是时光的穿梭与回荡。人们用温柔的吴越软语谈笑问候，路边有店铺在出售定胜糕、橘红糕及南浔独有的熏豆芝麻茶等诸种美食小吃。

古镇以南市河、东市河、西市河、善善河构成的十字河为骨架，其间又有许多河流纵横交错。我们坐上小船，在南市河的水巷中前行。那并不曲折的水巷，小船平稳地游弋其中，不起一丝波澜，忍不住伸出手去触摸那清凉的河水。岸上一枝枝枯藤上零星点缀着的绿色，也给这水乡古镇增添了一丝朦胧与惬意。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这座城市市民的气质与风貌。就是在这种历史与文化的气息中，我看到了一个厚实朴素的南浔、意韵绵长的南浔。在这里，我闻到了小桥流水人家的烟火，听到了悠远古雅旋律，看到了历史的鲜活和深邃。我眼中的南浔，更像一颗无比珍贵的明珠，它的千年气韵将永远地流传下去。



红色记忆